

# “四人帮”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货色？

董 辅 初

“四人帮”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在上海组织编写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上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它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它，进一步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 一、编写经过

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自始至终是在“四人帮”的直接组织下进行的，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挂帅，马天水在上海坐镇指挥，他们的御用工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内的余党朱永嘉、王知常具体组织。

1971年，张春桥亲自批准在原写作组内设立政治经济学组。同年6月，经他批准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张春桥责令“搞出一本反映我们（即“四人帮”）水平的教科书”。姚文元说：“成立政治经济学组，春桥和我赞成，搞出一个本子来很高兴”，“我们对这项工作，抱着很大希望”。马天水亲自主持第一次编写组会议。他说：“这本书两年内编出来也是伟大胜利”。从1972年1月开始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前后共写了五稿。

1972年9月写出第二稿，即《征求意见稿》，并整理出20个争论问题，由朱永嘉送给了“四人帮”。张春桥很感兴趣。10月3日，他说：“经济战线的斗批改还要好好搞。我觉得现在搞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需要，条件也够。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总结他逝世以前的经验。又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我觉得现在有条件，抓这个事是有需要的。自己不总结，弯路不少，经验也不少”，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发展，恶毒诬蔑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了“弯路”，要由他们这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结成的黑帮来“总结”。

1972年10月，张、姚窜到上海，于15日和18日先后两次召开座谈会，讨论整理出的那20个问题并“表示重视”。他们在会上一唱一和，大放厥词。他们极力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张春桥胡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有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又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现象，……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副书记，里面成分很复杂，有的原来是资本家，有的是国民党，有的是叛徒，有的原是共产党后是走资派”，简直是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好人。在所有制问题上，张春桥胡说，我国的“所有制问题未解决”，马天水呼应说：“公有制每天在被破坏，每天在建立”。在直接生产过

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当谈到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时，姚文元说：“一个阶级内部的关系，算不算阶级关系？……一个阶级的先进部分尚且如此，一个阶级更不必说了”，张春桥就说：“不说是阶级关系，那又是什么关系？”他在谈到工人阶级内部的关系时竟胡说：“走资派为什么还能活动？总是有人欣赏他嘛。”蓄意分裂工人队伍。在谈到分配关系时，姚文元则说：“各尽所能和按劳分配之间是否有一定联系？”他们在会上一再表示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希望快搞出来”。

座谈会后，朱永嘉等向编写组全体成员大肆吹捧张、姚，说什么：“不得了呀！两个政治局委员来开了会，多么重视！”“领导水平高”，“站得高，看得远。”再三组织讨论座谈会记录，要求“吃透精神”，作为编书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三令五申不许向外透露座谈会的任何消息。

根据张、姚在座谈会上的黑指示，编写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于1973年7月写出《未定稿》（即第三稿），内部发行。“四人帮”颇为赞赏。张春桥曾在北京向人吹嘘说：“上海这本书还不错，可以一读。”

这一稿又经修改，于1975年6月写出《未定稿》第二版（即第四稿），内部征求意见。这一稿在该年4月写成时，张春桥发表黑文，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作了全面篡改。编写组急急忙忙根据张春桥的这篇黑文又改了一遍，把“四人帮”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黑线。这一稿写出后，马天水鉴于这种忽忽忙忙的修改在贯彻“张春桥思想”方面还不能令其主子满意，大发脾气，不让大量发行。经朱永嘉说可以修改，马天水才决定印2万册，但勒令不许出上海。他亲自组织十个单位修改，要求“要象修改党章那样逐字逐句讨论。”同时，马天水还把书拿到原上海市革委会正副主任学习会上讨论。前后共讨论九次。马天水发表了不少谬论。他责令书中要加强对“条条专政”的批判，强调要联系上海的实际和“经验”，把“四人帮”在上海搞的一套上升为“理论”。对于这一稿，姚文元说：“人与人的关系这一章不错，可以转载。”于是，就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转载出来，以配合“四人帮”搅乱阶级阵线进行篡党夺权。

不久，朱永嘉向“四人帮”上报了一份《上海市委写作组1976年选题计划》。1975年12月31日，张春桥专门写了一条极为反动的黑批示。原文是：“要批修。批刘、林、邓、批托、布等。不批修，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好的。要知道斯大林错误的东西影响还是不小的。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应当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

接着，于1976年，又按照张春桥的这个黑批示对《未定稿》第二版进行修改。

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活动。这本书的编写也密切配合。朱永嘉每星期要去编写组两三次，催促抓紧写好，国庆节出书，最晚国庆后付印。他对书稿中拐弯抹角，没有直截了当地端出“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深感不满，说什么：“你们到现在还写出这种政治经济学，老一套”，“跳不出老框子”，“有些重要的话淹没在陈词滥调之中”，“太迂”。他叫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少讲一些，没有人会怪你们的，少讲基本理论”，“要触及时事”，意思是说，用不着那许多理论伪装，应该赤膊上阵，明目张胆地配合“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活动。朱永嘉还向人交底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就是说，只要这本书“站得住”，只要“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站得住”，“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就“有理”了，因此也就“好办了”。寥寥数语，道出

了“四人帮”组织编写这本书的全部反革命目的。

但是，他们何曾料到，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稿——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即第五稿，刚付印，“四人帮”就垮台了。我们后面要谈的就是指的这一稿。

在编写这本书的同时，还交叉进行地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作为《青年自学丛书》之一。后者的社会主义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本，观点相同。

## 二、荒谬的经济理论

这本书在理论上非常荒谬，它以“张春桥思想”为指导思想，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政治上极其反动，它完全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我们先看看这本书在理论上究竟是什么货色。

(1) 篡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本书以张春桥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作为立论的基础。全书充斥了“四人帮”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言乱语。资产阶级法权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无所不在的东西，实际上成了这本书的对象。书上写道：“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而资产阶级法权，又是他们可以任意瞎说一气的概念，他们爱把什么叫做资产阶级法权就叫做资产阶级法权。从而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胡诌取代了对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

(2) 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描绘成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差不多。书上根据“张春桥思想”，歪曲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经济特点的论述，曲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同志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既有共产主义因素又有旧社会残迹的观点，竟然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并说什么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而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就是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从书上的一些论述可以看出，就是资本主义，例如，“私有制”、“集体私有”、“私人劳动”、“私人产品”、“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三风、五气、资产风”、“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利润挂帅”、“价值追逐狂”、“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知识私有”、“私有经济的遗物”等等，用书上的话，它们都是资产阶级“要推行的”“资本主义的非”，都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竭力要“维护”的。运用这种臆造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无处不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无处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论证，“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于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了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只不过“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罢了。因此，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一极要再生产出无产阶级，一极要再生产出资产阶级。书上就是这样写的：“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一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按照这种说法，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将“不断”地在扩大

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这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书上明白无误地写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

下面再就几个方面具体地看看这本书是怎样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3) 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歪曲和丑化成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差不多。书上把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际上说成是“集体私有”，书上写道：“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对于国家和别的集体，又只是这个集体的私有”。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则被描绘成同资本主义企业差不多，“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生产 and 经营中的联系或相互关系。”书上还写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sup>①</sup>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请看，这样的“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不就是资本家么？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又有多少区别？鉴于书上胡说我国“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格化”，因此，书上实际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已经“蜕化变质为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4) 把劳动人民内部的新型社会主义关系歪曲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关系。书上写道：“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要受到这个主要矛盾的支配、制约和影响，打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烙印，因而使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互相关系，归根到底要表现为阶级关系。”从上下文和书中的其他论述可以看到，这种“阶级关系”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书上甚至胡说，在我国，“无产阶级处于被党内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地位”。

(5) 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书上说：“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按劳分配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书上甚至说：“知识私有、雇佣劳动等观念的存在”同按劳分配“有密切的联系”，“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

(6) 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歪曲和丑化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书上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的”，“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而“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书上把社会主义生产等同于商品生产，又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从而把社会主义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书上写道：“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经济毕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页。

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他们就是这样，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商品生产这一事实，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歪曲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样，价值规律，就被说成仍然“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还要“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起作用。

除此以外，本书的荒谬理论还很多，例如宣扬领导权决定所有制性质、思想意识决定直接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等。这本书怎样用历史唯心主义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这里就不多谈了。

仅仅从上面几点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全面篡改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毛主席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四人帮”组织编写的这本书则实际上否定所有制变更了，把早已获得解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巨大胜利的社会主义中国，说成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还有比这在理论上更荒谬的么？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极端荒谬，不能归因于理论上的无知，这种种荒谬理论完全是为了达到反动的政治目的而蓄意编造炮制出来的。

### 三、反动的政治目的

下面再从政治上看看这本书又是什么货色。

(1) 篡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这本书把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自己的对象，是为了实现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书里写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任务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从政治经济学上“论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必然地要产生“党内资产阶级”，而且“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正在“发展”，从而为“四人帮”抛出的那个“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书上说：“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又说：“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也就是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因为按照本书的说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就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书上是这样写的：“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换句话说，就是必然的、经常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的，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作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就必然地、经常地要“不断分泌出来”，不断“发展”。这样，“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有了理论根据了。

(2) 不仅如此，这本书还炮制了一个反动的“母鸡孵蛋论”。书上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它一经“形成”，就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由于这个缘故，按照书上的意思，它就成了母鸡，而产生它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成了蛋，“党内资产阶级”就“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新的资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不断地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产生”。这样，“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资产

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因此，“党内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要使“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蛋不致孵化出新的资产阶级，当然就得杀掉母鸡，“消灭”“党内资产阶级”。

(3) 那末，就人身条件来说，“党内资产阶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它是由“民主派”变来的，后者就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这本书也说，我们党的干部是“在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至今还没有“从民主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派”。这些由“民主派”变来的“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因此，书上说，“无产阶级为了胜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就是把党政军领导干部统统打倒，实行“改朝换代”。为此，书中对党政军领导人指名或不指名地进行了大量的恶毒攻击。例如，我国外贸工作的方针政策一向是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由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掌握的，许多重要的进出口计划都是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的。这本书却恶毒诬蔑我国的对外贸易“是一种官僚买办、卖国投降的对外贸易”，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又如，朱永嘉别有用心地强调书上要加强“条条专政”的批判。他把黄涛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首先发难的黑讲话拿到编写组，责令成段成段地抄进书里。王知常说：“条条专政要好好批一批，邓小平倒台了，现在批不是针对邓小平，而是针对现在还在台上的人。”可见，书上以批“条条专政”为幌子，攻击的正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以及其他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书上还按照张春桥的前述黑批示，疯狂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丧心病狂地把邓小平同志比作“托、布”，同“刘、林”相提并论，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全书直接点名攻击邓小平同志达五十多处。即使这样，朱永嘉还嫌“批邓太零碎了”，责令“要突出批邓”。

(4) 为了攻击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书上还以“批外修”作为幌子。肖木在编写组中传达张春桥的黑指示说：“批外修是为了国内”，肖木又说：“苏修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自己。”且看本书是怎么贯彻的。书上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实际上作为修正主义者来批判。在张春桥下达黑批示后不久，在1976年2月初，“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在会上竟然辩论“斯大林究竟是修正主义者还是半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批斯大林呢？书上根据张春桥的黑批示，胡说：斯大林对我国干部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要帮助干部从“修正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那当然就要批斯大林了。朱永嘉一再要求加强对斯大林的批判。他叫嚷：“斯大林是民主派”，“对斯大林可以点名批判嘛！”在他的指挥下，书上指名和不指名地大批斯大林，把斯大林的语录从第一稿的十多条砍得只剩下一条。

这本书还大批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的一个曾任过领导职务的沃兹涅先斯基。朱永嘉责令在书的附注中给他写一个小传，并要求特别注明此人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为什么突然对这么一个快被人们忘掉的人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要费那样多的笔墨去批呢？从批的一些观点来看，不过是借批他批斯大林。但这还不是真实目的所在。当时，朱永嘉曾组织人专写一篇沃兹涅先斯基小传，打算登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王知常对人交底说：“这篇东西要写清楚点，戳戳他们。”原来，批这个人也是为了攻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书上为他立小传，写明职务，则是唯恐别人领悟不出其中的奥秘。

\*

\*

\*

从上面这本书粗略的批判介绍可以看出,它是这样来为“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服务的:(1)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歪曲和丑化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四人帮”就可以打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2)胡诌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这样,“四人帮”就可以打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3)宣称“党内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在“发展”,这样,“四人帮”就可以打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进行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全国人民实行法西斯“全面专政”。总之,这本书是打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旗号,特别是打着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旗号,篡改这个伟大理论、篡改这个重要指示,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四人帮”组织编写的这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明证。它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可见,这样一本反动的政治目的同荒谬的经济理论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完全是一本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最后,有必要指出,本书原编写组内的革命同志,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获得了解放。他们也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揭批“四人帮”组织编写这本书的罪行。本文中有不少情况就是他们提供的。

##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编《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1976年9月)摘录

**本刊编者按:**“四人帮”在上海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一稿——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印得很少,没有发行。许多读者反映看不到原书,要求本刊提供有关资料,本刊特将该书的摘要分两期刊登,以供批判。摘要采取整段摘录的方式,按原书的顺序加以编排,篇、章、节的标题均照录原书,未加改变。原书中有大量极其恶毒地对邓副主席的指名诬陷攻击,不堪入目,我们没有编入,不摘录不足以看出该书反动观点的地方,以×××代替。以下是该书的摘录。

### 序 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了这场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